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9-4

2009年1月16日

亞細亞的“主義”

張承志

(一)

終於可以回到本書開頭的第一章：那個引子。

那位在青海省的貧瘠農村，揮撒殘生，徑顧把全部汗水、心情和積蓄都拋撒於斯、最後埋骨黃土的服部老人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？

當年，他奔向東烏珠穆沁的時候，胸中懷著的又是怎樣一種主義？

2007年夏天的一個晚上，我突然接到從青海打來的一個電話。是青海省政協的一個回族青年幹部，他通知我，後天在西寧，要舉行服部幸雄老人的骨灰安放儀式。屆時受到過服部援助的許

多蒙藏回漢的各族師生，還有服部夫人和子女都將抵達西寧。知道我是逝者的生前友人，他希望我能夠參加。

我沉吟了一會兒。老人白發飄飄、滿口烏珠穆沁的音容浮上眼前。

第二天夜裡，我飛抵了西寧。

早晨，在西寧鳳凰山，罕見的儀式開始了。我目擊著一個日本人的遺骨，在喇嘛的紫紅袈裟和回族的雪白帽子環繞下緩緩放入墓穴，當穆斯林們捧起雙手接著都瓦，藏族喇嘛一齊唸起經文的時候，渾身被一股異樣的感動席捲。主持人要我講話，我居然哽咽，說不成句！

記得我只是對著墓穴，像喊叫一樣說：

“——再也不能，一塊談論東烏珠穆沁的事了！”

……，……

他在暮年，把東京的兩個店裡的收入，都送到青海貧瘠農村的學校——這邊的語言稱之“扶貧”，用他的話卻是“教育可是重要啲”。從黃河南，到青海北，他像撒傳單一樣，把自己措來的日元，擲向荒涼的高原。不問對象，不管地區，只要是村“窮”且孩子要“學”，他就把錢送到手上。我堅信，受惠於他的蒙藏回漢，那些閉塞農民並不知他的底細，大約把他想成了億萬富翁。沒人相信他在東京過著清貧的生活。他究竟每年帶來了多少，一共投入了多少，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。

離開青海前，在向他夫人道別時，我有一絲遺憾。

因為有一個問題尚未究明。關於他青年時代的理想。我深知，用友好、和平、贖罪等等觀點，並不能解釋他的心思。他是個固執的人，崇尚行動的人，贖罪之類說法實在離題太遠了。因為他，或者仍在拒絕什麼罪意識，或者有一些也埋藏得很深。能肯定的只是——他滿懷著豪情，以青海的行為，繼續實踐自己年輕時未竟的、“亞細亞解放”的理想。

這亞細亞的理想，究竟是什麼？

(二)

歸納“亞細亞主義”的全貌，是一件很麻煩的事。

它是國家的一項戰略，也是民衆的一股思潮。它是一塊侵略和奴役弱小近鄰的遮羞布，也是一份揭露和對抗白種殖民主義的宣言書。它疊印著日本國家擴張與侵略的歷史，又染透了日本民族的視野和熱情。

它在退潮時無影無蹤。

但某一天我突然意識到：它活在很多日本人的行為中。

我能梳攏一個梗概麼？

只能提出一些例子，讓讀者分析它們。

1、

1912年12月23日，在英國殖民當局舉行的、慶祝把首都從莫臥兒王國舊都鄂爾多·德里遷至新德里的典禮上，突然發生了爆炸。總督哈丁受了重傷，典禮一片狼藉。

安置炸彈的，是早期印度獨立運動的一名領導人R·B·布斯（Rash Behari Bose, 1886~1945年），激進派的獨立運動領袖。

事件後，布斯陷入極大危險，在殖民當局的高壓下，他終於決定逃亡海外。突破了嚴密追查，他於1915年經由加爾各答，逃到了剛在日俄戰爭中大勝的日本。

當時的日本政府根據日英條約正與英國結盟，對印度的革命分子態度嚴厲。布斯的目標，是從日本購買手槍等軍火。但在日本不能得手，艱難之中，他認識了孫文。

大約是在孫中山支持下，他從上海購得武器向印度輸送；無奈又被英國當局查覺，不僅軍火被沒收，機密信件也落入英警之手。英國立即向盟國日本提出逮捕布斯。日本政府採取了拖延曖昧的態度，一段時間裡，未對布斯採取行動，只把他置於監視之下。

一個朝日新聞的記者，從孫中山處聽說了這位印度獨立黨的首領。此事引起了記者的熱意和關心，於是孫中山等一些中國人安排了印度獨立黨與日本媒體的會見。席間，廖仲愷把 R·B·布斯的英語先譯成漢語、王統一再把中國話翻成記者聽的日語——若干天後，一篇題為〈歐戰與印度〉的文章，刊登在朝日新聞上，日本市民對印度獨立的關心，頓時應聲鵲起。——後來，這個記者（山中峯太郎）改行成了超人氣的作家，所作冒險小說《亞細亞的曙光》裡，就有一個人物是印度的革命家。這篇小說在《少年俱樂部》上連載，強烈地震撼了整整一代軍國少年的心。

雖然在媒體的熱烈配合下，布斯（還有另一名印度人 H·古普塔）獲得了日本國民的義憤和同情，但憲警監視日嚴，他們漸漸陷於絕境。布斯和古普塔再去求助孫文，因而結識了一代所謂志士：宮崎滔天、大川周明、寺尾亨和頭山滿。

就這樣，印度流亡者一面爭取日本亞細亞主義者的支持，一面迫不及待開展反英獨立的宣傳。他們的行動惹怒了英國政府，英國對日本的態度變得強硬了。終於，日本政府決定，要求 R·B·布斯等人限五日之內離境。

朝日新聞最先報道了政府的逐客令，並批評如此措施“疏隔亞細亞國民之同情”、“將及頗大影響於三億印度人對日心情”。

而對布斯一行而言，離境就意味著被捕。

他們馬上去找頭山滿。

頭山滿是日本最著名的“志士”、右翼結社玄洋社的精神領袖，在軍政各界有著鉅大的影響力。早在布斯之前，他已援助過M·白勒克屯拉——另一個印度的穆斯林革命家。白勒克屯拉原是東京外國語學校的教師，編輯宣傳獨立反英的報紙，參與犬養毅、頭山滿等人組織的“亞細亞議會”。後來在1915年，還曾就任在阿富汗建立的“印度臨時政府”首相。

玄洋社成員們認為：屈服於英國的壓力、不惜看殺志在獨立的印度友人的日本政府，乃是“義勇之國日本”的恥辱。頭山滿決定抗命，隱藏保護R·B·布斯，並說：我去代他坐牢。

話分兩頭。

此時，新宿糕餅店中村屋的老闆相馬愛藏和妻子相馬黑光，讀到了報紙上政府驅逐印度志士的消息。他們大為憤慨，商量想為此事助一臂之力，即在自家匿藏兩名印度人。

當日的經過如一場驚險戲。

頭山滿聽說了中村屋可能出力，連忙請中村屋主人來面談。當夫妻兩人抵達頭山宅時，頭山滿大聲喊：

“天川屋義兵衛，拜託了！”

——天川屋義兵衛是“四十七士”故事中，一名膾炙人口的支援復仇大計的“義商”。刻不容遲，宮崎滔天派人通知兩印度人立即趕到鄰近的寺尾亨家，然後再從寺尾邸後門潛入頭山滿宅。

在外面，女人敷衍警察，不遠處，有汽車暗中停候。就在警察眼皮之下，環環相扣，演出逃亡。R·B·布斯和古普塔化了裝，穿過鄰居房間，汽車全速開走，駛向新宿中村屋。

後來更有這樣的傳說：據云監視大門的三個警察曾懇求頭山滿交出印度人。他們說，請您救救我們，把印度人交出來，不這樣我們三人都得丟飯碗。

頭山滿卻教訓警察曰：你們做了好功德。哪怕你們丟了飯碗，要是幫助了印度志士，那就是幫了三億印度人！

兩名印度人就這樣進了中村屋。

店裡主僕竭盡全力，掩護隱居。據《中村屋的布斯》一書，那時的一般日本人，大都懷著一種“心情的亞細亞主義，它並非一種從屬政府上命的東西，毋寧卻有反政府傾向的一面”。這種懵懂的反骨和傾向，或多或少，與反對白種人的殖民擴張有關。

在中村屋，以後漫長的勞心勞神，難以細表。

一件著名的花絮，是蟄居密室的兩個印度人，教會了中村屋店裡人做正宗印度咖哩飯。至今，東京新宿中村屋的印度咖哩料理，名氣大、味道純，在日本首屈一指。而且，就連名稱都不用轉自英語的カレー(karee)，而用接近印地語發音的カリイ(karii)。

兩年後是 1918 年。H·古普塔已經轉去大川周明家中隱匿。而頭山滿提議中村屋，把女兒嫁給 R·B·布斯。父母與女兒商談，女兒相馬俊子表示願意。這樣，印度革命家成了日本人的女婿。

他倆生下了兩個孩子。後來俊子不幸去世，布斯不舍舊情，終生不娶。

R·B·布斯就這樣心在印度身在日本，一生為驅逐安格魯撒克遜的白人殖民主義和印度的獨立，嘔心瀝血，奮鬥不歇。自然，他認定這一遙遠曙光的光源，是強大的日本。

他的思路，與軍國日本的步伐，時而分道時而合轍。在 1924 年前後，他的思想與孫中山在神戶發表的大亞細亞主義著名講演達到一致，即嚴厲批判日本對中國的侵略；但在 1931 年以後，他又連續支持日本發動的“9.18 事變”和盧溝橋事變。一旦太平洋戰爭爆發，R·B·布斯歡喜若狂，以為亞細亞和印度的解放已至眼前。他急切盼望日本出奇兵、一舉解放英國盤踞的印度。……但是，當軍國日本發表所謂“大東亞共榮圈”時，其中並沒有列入他的祖國印度。他大失所望，和另一個朝鮮失意者相抱痛哭，飲泣酒館，吞下昨天保護了他們的日本帝國今天為他們釀下的苦

酒。

殘酷的翻弄是連續的，R·B·布斯從德國法西斯的勝利中又發現了好消息，1941年他在納粹黨旗下講演，呼籲與德意的結盟。

印度政治家並不都是布斯。

甘地和尼赫魯等人認識到，日本的行為只意味著一個“新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誕生”，他們不僅尖銳批判日本的侵略，還向中國派遣了“印度國民議會派醫療使節團”。其中的柯隸華大夫如印度的白求恩，他在貧瘠的黃土高原投身抗日戰爭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，並獻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但是布斯的思想，無疑相當普遍。

珍珠港戰事的同月，日軍開始馬來半島作戰。印度革命者與日軍情報官共同講演，訴說日軍將幫助印度獨立的話語。在場的群眾如同陶醉一般，每聽一段，都掀起一陣“爆烈的鼓掌和歡呼”。

當日軍攻克新加坡——這個英國殖民者在東南亞的要塞之際，在日軍與印度人策動下，英軍中的印度兵大批倒戈。英軍無條件投降，把部隊中的印度兵名簿交給日軍。日軍情報官藤原、印度獨立聯盟的普利達姆·辛、剛剛編成的印度國民軍將領莫漢·辛，一起發表了熱烈的演說。

聽眾陷入了瘋狂。“不休止的拍手，飛上天的帽子，揮舞的手臂”，淹沒了新加坡的印度街區——沒有人譴責和理睬日軍同時對華僑的屠殺。隨後，這支新編的2.5萬人的印度國民軍，便開始與日軍協同作戰。

再回到中村屋。

女主人黑光（原名良），是一位傳奇的知識女性。她一生與眾多藝術家或學者交往，她主持的沙龍，曾是東京的油畫、演劇、俄羅斯文學的一個據點。相馬黑光和她的丈夫是一對典型的亞細

亞主義者。這對夫妻代表了相當多的普通日本人，對軍國擴張途中的亞細亞解放輿論，弄假成真，身體力行。

她在自傳《默移》中寫道：

當從報上讀到印度人被限期離境的消息時，大家都想，諺語云窮鳥入懷獵師不殺，英國趁世界大戰之機，給印度志士加以德諜污名迫日本逐客，而日本竟欲引渡他們給正待機捕殺的英國，這是多麼可恥的事！

當時夫妻店的經營正好，每天都出入來購買麵包的知識分子。一天，老闆愛藏聽一個記者說，頭山滿先生正為隱藏兩個印度人發愁，突然想到自家裡面的畫室，就順口說：我家的畫室，正空著無人！

沒想到記者把這句話轉告了頭山滿。那一天，已是對兩名印度人限期離境的最後一天。頭山滿聽說了這個消息，連忙請店主人即刻趕來。等到夫妻乘電車到了頭山邸，距離期限只剩下四個小時了。前文已述，頭山滿指揮了一幕逃亡劇，夫妻倆把印度人接到了家。

一進門，黑光就開口英語：

“Welcome you have been saved”（歡迎，你們已經安全了）。

印度人大吃一驚，從此刻開始，見識日本的女流俊秀。

畫室在二層，與孩子的房間在一起。中村屋立即大搬家，把孩子移至母親房間，再召集 30 餘名店員，對之曉以大義：

這些人遠遠跑來，一身託付日本，政府卻看殺他們，所以中村屋要保護。記著兩條性命，絕對不許洩漏！……大家都感動了。老闆接著說：要是不小心讓他們落入死地，不光是中村屋的恥辱，日本人也沒有臉面！

黑光更要求從此要給印度人端茶送水的女僕：“對神佛起

誓！”

——大概，這就是浸染了一般民衆的、所謂“心情的亞細亞主義”。

外面的世界，正因為兩名印度人的消失大肆喧嘩。警視廳甚至判斷，外國人都愛吃牛肉，搜查了家家肉鋪——完全不知印度教徒不食牛肉。順便說一句：後來其中一個印度人逃到大川周明家請求庇護，大川為他買來的是親子碗，雞肉雞蛋的蓋澆飯。

一個當教授的常客來買麵包，自負地說他知道印度人藏在哪兒。愛藏問時，教授自負地說：還用說嗎！肯定藏在總理的家裡嘛！這樣他們松了一口氣，知道事情大概不會泄露了。

後來發生了英艦炮擊日本船的事件，頭山滿等人借機造訪外務省，強硬地要求撤回驅逐二名印度人的命令。

日本政府接受了這一項民間要求。以後，英國大使館僱傭私家偵探，窮追不捨。中村屋也四處移居，掩護著布斯。

頭山滿提議：把中村屋小姐俊子嫁給布斯。但是，以前黑光已經干涉過女兒與畫家中村彝的婚談，此時聽了頭山滿的要求，不能不陷入煩惱。

確實布斯出自名門是值得尊敬的人物，但也不像個能一生平穩生活的人。我是在正義的名下照顧他，到了這般地步若是拒絕婚談，恐無臉面去見世人，對頭山先生也難全義理……

不料女兒俊子的態度卻意外地堅決：“讓我去吧！我心已定。”

於是，日本與印度之間的一次由婚禮象徵的儀式，在多位要人參加下舉行了。頭山滿夫人親自領著俊子做了頭髮，換了漂亮的嫁裝。

在政治上追隨殖民主義國策的女主人黑光，在生活中卻屢次

幫助祖國淪為殖民地的朝鮮人。

正是朝鮮爆發暴動高呼獨立萬歲的時候，晚間有客來訪中村屋，提著一個箱子。是店裡的年輕女僕、朝鮮人林靜子的親戚。談話間，黑光瞥見箱子，猜到受歧視的朝鮮人在東京難尋住處，就請這位“林”留宿自家。

十幾天裡，林早出晚歸，一手總提著箱子。黑光熱心照顧，還邀他去觀劇。幾天後警察來了，要黑光去警署談話。黑光正與警察周旋，剛巧林回來了。黑光雖毫不知情，但直感不能讓林見到警察。於是她若無其事，打發林先去畫室。警察與林擦肩而過，並未識破這朝鮮人。約十天後林告辭回鄉，黑光派靜子和一個店員去車站送。後有警察打來電話，詢問一個姓林的，黑光才恍然大悟：林乃是朝鮮“三一事件”的要犯。

三人都在車站被捕。愛藏聞知趕去，向警察提出“嚴重抗議”，帶回了靜子。林被押解回朝鮮，那隻箱子據猜測裝的是傳單。

也不僅亞洲人。

當日本警方驅逐俄國的盲詩人及世界語學者愛羅先珂時，中村屋的女主人又同警察一度交戰。她照顧愛羅先珂不僅只在茶米油鹽，而是從藝術到語言與這位俄國盲人交流。圍繞著她，沙龍來客舉辦俄語學習會，進行油畫速寫，幾位畫家以愛羅先珂為模特畫的人像，都評為名作。

但詩人愛羅先珂依然還是因社會主義者的嫌疑，遭到了被驅逐的命運。執行驅逐令的當夜，20餘名警服便衣受命而來，在中村屋泥足入室，翻箱倒櫃，不由分說，把嚇得半死的俄國人抓走了。

但黑光和丈夫並不容忍，動員媒體，搜集證據，誓向警察討回公道。報紙記者大大配合，次日報上，標題都是：

單為俄人之理由，小題大做

對盲詩人愛羅先珂，驅逐命令
警官泥靴直上二層，不聽不問抓人
愛氏遭踢遭打，窗門破壞狼藉

次日警察看了報，跑來懇請說和，夫妻根本不聽。律師忠告勿與警方作對，他們更嗤之以鼻。終於以“違反行政執行法、濫用職權”，把警察告上了法庭。若干劇作家和作家都積極參與抗議，夫妻還拿出警服鈕扣、碎了的木拖鞋等物證，一個始終旁觀的人力車夫也充當證人——此役大獲全勝，迫得澱橋警察署長不得已引咎辭職。

《新宿中村屋·相馬黑光》總結了如此行為之後的動機。

中村屋女主人黑光的心裡，並沒有“主義”。但她自幼懷著一種“根性”，富於同情並敢於承當。這一氣質在一個鼓吹亞細亞的時代被點燃了，對她而言，凡身處苦境的人都要援助，至於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、是日本人或外國人、是男人或女子，並沒有關係。

愛羅先珂被逐出日本，到了當時正被日軍佔領的海參崴，後來轉輾到達北京。如同與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者跑一場接力一般，中國知識分子繼續給這位盲詩人以關懷。

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，聘請他去北大教授世界語。魯迅等中國著名文化人，都與他結為朋友。魯迅從日本報紙密切注意著愛羅先珂的消息，他和中國同道有感於責任，聯手譯了《愛羅先珂童話集》和《桃色的雲》。魯迅由日文翻譯，寫了約十段題記序跋，此外還有小品〈鴨的喜劇〉，收入著名的《吶喊》之中。

其中〈小雞的悲劇〉中所寫的，一個總喜歡和鴨子為伍的異色小雞，其命運心境，可能最貼近愛羅先珂。

(小雞問小鴨：) “你有過戀愛麼？”

(小鴨回答說：) “我沒有過戀愛，但曾吃過鯉兒。”

魯迅題記云：日語裡，戀愛、鯉魚都是koi（こい），這兩句是雙關語，中文無法可譯。點滴之間，愛羅先珂的心情與才華，朋友們對他的相惜之情，今日讀著，可聞可觸。¹

這確是一段美談。如此的人物和相交，如不同民族間的一種希望。今天我們不禁嘆息：這樣的故事，已很難尋求了。

當然，相馬黑光並不能脫出時代的束縛。

在南京陷落時，中村屋店前滿是提燈遊行的歡呼人群。她也發動店員，為侵華日軍縫慰問袋。當印度詩聖泰戈爾訪日時，她設宴款待這位她女婿布斯的好友；但聽到泰戈爾批判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時，她卻表示非常遺憾。她並非日本的右翼，卻心醉於頭山滿的胸懷大度和人格豐滿。

她對右翼首領頭山滿的崇拜，引發了兒子虎雄的逆反。兒子拒絕母親安排的道路，於是展開了與母親互相傷害的拉鋸。剛硬的黑光命令兒子退學，把兒子趕出家門。兒子則奪走家裡的錢，日益傾向左翼活動，並一次再次被捕。虎雄甚至掐住獄警脖子，被關入單人牢房。他對母親的反抗也表現在私人生活上，他異常暴躁，不惜毀滅母子關係，與中村屋一名叫靜江的女工結合。後來他消失於中蒙蘇的邊界，一生沒有原諒自己的母親。

2、

在懷疑之末，看來已經該說，“真誠的亞細亞主義者”，是確實存在過的。

如果它的最小例子是在東烏珠穆沁度過了青春、在青海埋骨的服部幸雄，那麼它最大的代表，大概該數到宮崎滔天。

¹ 〈小雞的悲劇〉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十卷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，第 208 頁。

再舉一個例子。

這就是青年毛澤東和他的朋友蕭三一起，求見日本著名的亞細亞主義者宮崎滔天一事。

宮崎滔天，傳奇的日本浪人，通常被劃為右翼思想家。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期間，他與孫中山如結金蘭，而後畢生支持孫中山一黨，鼓吹反清革命。當早期國民黨政治家黃興逝世之際，他親至湖南，為黃興送葬。此舉在湖南驚動輿論，使青年毛澤東仰慕不已。

毛澤東親筆致信給宮崎滔天，求能一見，並對此青春舊事念念不忘。1956年滔天之子宮崎龍介訪華，在天安門城樓上，還是毛澤東主席提及了此事。周恩來郭沫若在場，廖承志做的翻譯。宮崎龍介歸國後不敢怠慢，清找所藏，屢尋不見，幾至斷念。不想後來，真的發現了這一墨寶！

毛澤東的親筆信全文如下：

白浪滔天先生閣下。

久欽高誼，睹面無緣，遠道聞風，令人興起。先生之於黃公，生以精神助之，死以涕淚弔之，今將葬矣，波濤萬里，又復臨穴送棺。高誼貫於日月，精誠動乎鬼神，此天下所希聞，古今所未有也。植蕃、澤東，湘之學生，嘗讀詩書，頗立志氣，今者願一望見丰采，聆取宏教。惟先生實賜容接，幸甚幸甚。

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生

蕭植蕃

毛澤東上

此信乃是毛澤東和蕭三前去求見、並邀請宮崎滔天前往第一師範講演的學子投書，事在1917年3月。

田所竹彦《孫文——看破百年之人》和《浪人與革命家》兩書，都收入了毛澤東的這一墨跡。據該書，宮崎滔天接受邀請，

在講演中“呼籲亞細亞的振興，黃色人種的團結”。

他的講演顯然充滿魅力，著迷的學生致信滔天，說“先生乃東亞偉人，道德高重見識拔群。……仰教於先生不僅日本人之幸，亦為中國人之幸、黃種人之幸。”至於宮崎滔天是否與毛澤東有過交談、以及他們彼此的印象，就實在無從得知了。田所竹彥嘆道：“哪怕 1956 年在天安門上的人，已經沒有一人留在此世！”²

也就是說：包括毛澤東主席本人，對當年“亞細亞主義”的言說，都不僅持肯定態度，而且對之滿懷留戀。

宮崎滔天（寅藏、虎藏）出身九州的名士之家，父親是劍道教師。1877 年西鄉隆盛舉兵反對明治政府時，他的兄長中，主張自由民權的八郎加入其列並死在戰場，成了一個不被靖國神社供祀的亡靈。戰後父親召集子弟，命他們永遠不許謀求官途。

宮崎三兄弟中，一個哥哥民藏，熱心於土地平均，後日影響了孫中山“平均地權”論的形成；另一個彌藏，主張“去中國結識英雄，共同復興中國，恢復人權，創世界新紀元”。寅藏滔天，則繼承了家族的反骨血氣，自青年時追求亞洲解放的大業。

他結交朝鮮親日派政客金玉均，受金的“亞細亞問題決於支那興亡”的觀點影響，幾度進入中國。一面痛感中國也有和日本浪人相通的“健氣”人物，一面摸索參與革命的方式。經人介紹，與孫中山結為密友。

宮崎滔天在回想錄《三十三年之夢》裡，追憶了他與孫中山的初遇。

滔天抵達孫文客寓，女僕說客人尚未起床，滔天便在庭院立等。不久，一個穿睡衣的男子出來，請他進屋，這便是孫文本人。

與他對坐的孫文並不漱口，“滿不在乎有輕躁之感”。滔天稍稍心中吃驚。接著交換名片，互作致意。滔天見到了久聞的孫

² 田所竹彥：《孫文——看破百年之人》，築地書館，第 154 頁。

文不免高興，但他在第一瞬間對孫文的印象是深刻的：“舉動中欠缺其重”（舉動に重みがない），他多少有些啞然。洗臉後，孫中山換上西服，一副紳士模樣——但依然並無滔天想像的、某種豪傑之風。

話題一旦轉入中國革命的韜略與目的，滔天說，初似處女的孫文，開口則有脫兔之勢。進而漸如虎吼深山，而且語言簡潔，句句切中要點。

滔天於是釋疑。他斷言，孫文其人已在天真境地，思想之高，情念之切，能與之比擬的日本人沒有一個！“實在是東洋珍寶，從那一天我便為他傾倒。”

兩人筆談時使用的部分紙片，一直為宮崎家珍藏。以後在孫中山約十年的亡命日本生涯裡，兩人相知相助，周遊日本，滔天為孫文介紹了犬養毅等日本大人物，孫文則在滔天的幫助下，結盟建黨，游說資金。宮崎家每每成了孫文的活動據點。滔天不僅與孫文，也與眾多國民黨元老結為至交，黃興、蔣介石、汪精衛、胡漢民、戴季陶、蔡鍔、章士釗，數不勝數。滔天與黃興初逢的一次，其時與眾位中國革命家同席。兩人對坐著吐露胸襟，不飲不吃對談兩小時，終於話語溝通，才雙雙舉杯。

當時孫中山是清朝通緝的要犯，滔天把他介紹給日本政界時，一些人避嫌不見。滔天說：官員總是官員樣，我乃是我，絲毫沒有膽怯。黃花崗起義中黃興右手被炸掉兩指，送給滔天的墨跡上，題款都是“黃興左手”。黃興甚至出資幫助滔天蓋起家宅，並為題匾“弢園”。後來孫文領導的興中會和黃興所率的華興會合併為中國同盟會時，由滔天的同志、黑龍會首內田良平提供住宅，作了儀式會場。黃興於1916年病逝上海，滔天不僅守候病榻，而且親身送棺湖南。前文已述——此舉震動了中國人，也震動了還是學生的毛澤東。

辛亥革命功成，孫文衣錦還鄉。滔天在香港迎接孫文，在南京參加了孫文就任大總統的盛典。1922年宮崎滔天逝世時，孫中山在上海主持盛大的追悼儀式，國民黨要人全體聯名，為這位日本浪人致哀。

— 他不僅一廂熱衷中國。

既是亞細亞主義，滔天對亞洲諸弱小民族的“志士”，一概同情。早在美西戰爭之前，他就與孫文密謀、通過犬養毅，援助菲律賓人蓬塞(M. Ponce)領導的民族獨立運動。其中主要的動作，是把軍火武器運到起義者的手中。雖然由於武器船沉沒、大事敗於綢繆，但滔天設想的、從菲律賓到中國、造成天下蜂起局面的思維，卻令人慨嘆。

他在1907年寫的《革命問答》中說：“既同情自由民主博愛的法蘭西，也同情王政復古的日本維新。進步的革命我都贊成……革命的到達點是四海兄弟，它不是無政府主義、也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，是自然自由的境地。”

滔天論及志士浪人，依據“恆產”和“恒心”，把人做分類如下：

兩樣佔全者為順民。兩樣皆無者是無賴。有恆產無恒心者不過花花公子，無恆產惟有恒心者為士。所謂志，即是士之心。志在天下，濟世救民。空懷此志而不得機會、鬱悶於困窮者即為浪人。

他接著抒發胸臆：

浪人終生不可失其志。意志薄弱、無能且憤世者，無浪人之資格。貧窮於人皆是苦痛，慣於浪人生涯則不覺其苦。與此相比，那些一時充數的浪人對貧困神經過敏，折節於一月工資，攀纏於一席虛職，宛如軟骨動物。……

世上尚有稱作文士的藝人，大都既無能發現真理貢獻於世、又不敢指摘不平警告同胞、且更無殉於主義思想的覺悟。僅為苟活而

寫。或曾意在執筆，其實不過筆下囚徒！³

對各有心事的朋友，沒有不散的宴席。

宮崎滔天逝後兩年，孫中山北上途經神戶，渴望與包括郵政大臣犬養毅在內的舊交晤面，爭取以外交辭令，一舉廢除國人不能容忍的“二十一條”。犬養毅不能抽身，只有頭山滿抵達神戶與孫中山會談。

頭山滿不僅熟知孫文的腳印，更看透了孫中山的心思。大概由於他聽慣了孫文以滿洲主權求購日本支援的話語吧⁴——他迎著孫文的話頭，強調了日本對滿洲的主權要求。

頭山滿說：往昔滿蒙地方受到俄國侵略之時，我日本付出莫大犧牲，為保全貴國而制止之。如今若輕易即行交還，恐我國民，多數不能應承。

孫文見狀當即轉移了話題。

頭山滿的強硬表態，使孫中山最後割斷了機會主義的幻想。他知道，已經到了結束甜蜜的周旋、結束亞細亞的空談、結束危險的政治交易的時刻。三天後，孫中山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發表演說，論述亞細亞主義。

在羅列了東方的“王道文明”與西方的“霸道文明”之後，孫中山向日本國民提出了著名的呼籲：

究竟做西方霸道的番犬，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，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！

孫中山這一番慷慨激昂的時間，已然到了他大權在手之後，而不是革命尚未成功的辛亥以前。頭山滿似乎無動於衷。當時各

³ 田所竹彦：《浪人與革命家》，里文出版，第57~58頁。

⁴ 楊天石：〈孫中山與“租讓滿洲問題”〉，《從帝制走向共和——辛亥前後史事發微》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。

種媒體包括神戶的報紙，都沒有刊載講演內容。

留下了宮崎滔天，繼續成為一個謎。

很難猜測滔天若是活到 1924 年，對老友的呼籲會怎樣回答。宮崎滔天對這番話語是否聽得進、生性坦蕩的他會怎樣付諸行動，是最饒有興味的問題，可惜只能任人亂猜了！

也許宮崎滔天具備一線可能、跳出日本人的局限？

但這是一個嚴峻的話題。跳越局限，就意味著先完成對浸透自己頭腦的，明治以來皇國崛起、日本優越思想的決裂。這一決裂會極為痛苦，那將等於絕對的孤立。

3、

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者形形色色。他們的起源、主張和實踐，因人而異。

一類是啟蒙的思想家。大川周明是一個最有特點的例子。

— 還是用一個戲劇性的故事開頭：

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的第一天，有過一個匪夷所思的鏡頭：坐在後排的惟一的知識分子甲級戰犯大川周明，突然站起，揮掌打了前排的東條英機的光頭，同時口中唸唸有詞。

滿場一片譁然，大川周明被押下。

後來才知道他說的是德語 — “印度人，到這兒來！” “你滾出去！”

他被帶去作精神鑒定，結果診斷為梅毒引起的腦障礙。於是起訴被撤除，大川周明住進了醫院。

無人料到，他一進醫院就埋頭其中的 — 是伊斯蘭研究。

兩年半的時光，在醫院裡他完成了畢生之作：《古蘭經》全

譯。此作雖然不是譯自阿拉伯文而是以英譯為底本，但據云參考了十種語言的譯本，1949年譯完，由岩波書店出版。他本人述懷說，35年宿志，一朝得以完遂。晚年他更潛心於“穆罕默德傳”的執筆，但書未出人已死。在此之前，他還著有一冊《回教概論》，被竹內好讚為“日本伊斯蘭研究的最高水準”。

大川周明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，專攻印度哲學，日本著名的右翼思想家。據中亞學者前嶋信次說：他在東大上學時，總去大學圖書館讀英文《古蘭經》，一時被人編成歌，戲唱“圖書館，高鼻男子讀古蘭”。他早年迷醉於印度哲學，把印度視作神聖之國。後來因讀了一本《新印度》，書中描述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，使他一夜改尋新路，轉向亞洲和殖民地問題。為學習法語他常去教堂，一度曾為天主教吸引。竹內好說，大川周明是個拒絕宗教情緒的人，卻對所謂普遍宗教懷著憧憬，也許就因此，晚期的他把自己結合於伊斯蘭。

後日他組織右翼結社，並參與策劃“5.15政變”，被捕入獄。在監獄裡，他沉湎於歷史，寫下40冊讀書筆記，編成了三大冊《近世歐羅巴殖民史》。

大概因為欣賞自己獨特的經歷，他的自傳《安樂之門》第一章題為“人在獄中亦能安樂生活”，第二章則題為“人在精神病院亦能安樂生活”。

他的印度學和印度觀，形成於對印度獨立運動的支持。前文已述，當避難日本的印度志士古普塔逃到他家，大川周明不僅敢於庇藏逃犯，而且與印度人抵足共眠，日夜深談，長達三月，後來寫成了《印度國民運動的現狀及其由來》。這篇文獻，逸脫了冬烘學院的猥瑣旁觀，文字之間寓有行動。

如此對印度的支援，在印度換回的好感不言而喻。戰後，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日本，舉行招待會時特別邀請這位原甲級戰

犯。雖然大川周明因病未能出席，但他擁有的“印度獨立恩人”的地位，已牢固不動。

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大川周明在 NHK 的廣播中，舉行了連續 12 次的《美英東亞侵略史》講座。基於現場速記，次年出版了同名單行本，在日本被廣泛閱讀，成為首位暢銷書。

這是為日本對美英的戰爭，以實證提供根據的一本書。因為他在東京審判中的病態，人免予起訴，書也避開了法庭的追究。

大川對中國問題的發言不多，因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度和西亞。他是最早向日本介紹土耳其的凱末爾、阿拉伯的伊本·沙特、伊朗的巴列維、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魯的人，也是最早留意中國穆斯林古典中“回儒不二”思想的人。他從這一思想出發，思考著東方精神的一致點，企圖用東方共通的“天道之理、萬物一體”的觀念，尖銳對抗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政治經濟的意識形態，進而居高眺望未來。

正因為大川周明的關注點超出了一般日本亞細亞主義者的視野，所以導致了他的思想在兩個方面，至今引人重視：

首先，亞細亞所以成為問題、並引出了亞細亞的“主義”，正是由於歐美對亞洲的侵略、殖民和掠奪。

西方霸道的炮彈和商品，首先瞄準的別非他處，乃是印度。大川周明的出世並不偶然，由於具備印度學識的根基更能放眼印度的現實、在感悟印度的苦難中追究西歐殖民主義的源頭、繼而在與印度革命的密切結盟感覺中豐滿自己的印度觀點——不僅他本人，包括日本標榜的“抵抗歐美殖民主義解放亞洲”的吵嚷、即所謂亞細亞主義，都有了某種可信和真實。

其次，歐美西方的白種優越和他人歧視，是從漫長的、從近東至西亞與穆斯林世界的政治、軍事、文化的角力之中發展膨脹、並在其中孕育的學識中形成的。由於大川周明長久地觀察、且在晚期集中精力向伊斯蘭思想謀求出路，他的亞細亞觀點，更進一

步囊括了比印度更關鍵的世界——近東、中東、土耳其。那裡是整個東方的邊界，是遏制、抗擊、甚至東風壓倒西風、戰勝過西方殖民主義的核心戰場。這一遏制和戰勝的武器，不是刀劍而是文化。這一文化稱為伊斯蘭。大川周明在鐐銬加身之時、在懵懂摸索之中似有所悟，於是傾心於這一文化的兩大支柱：古蘭與聖訓。

具備伊斯蘭學識基礎的人會明白：這一方向，已經不再是竹內好激賞為“過去甚至以後都無人能超過”的《回教概論》的秀才學技了，恰恰是“概論”天下時代的大川周明尚未跳出對伊斯蘭的帝國主義猜想——而他的晚年，卻瞄準了 E·薩依德揭露的“東方主義”的靶心。

誠然，臨盆於日本帝國的胎盤、又賭命於一種完美的理論，說到底是前定的徒勞。但人們也應如竹內好所說，不必因人廢言、談及大川周明便生“不潔之感”。我們該有勇氣說：大川周明的摸索，不僅對和平降臨後的日本，甚至對仰望富強的中國，都是一份難得的饋贈。

魯迅研究專家、亞細亞主義的闡釋者、正在中國知識界流行的日本左翼思想家竹內好，居然是大川周明的知音和熱烈鼓吹者。

竹內好一再撰文演講，稱道這位日本右翼的思想魁首，指出他的種種局限，更指出他受限於時代的不得已。他提請人們注意大川在東亞經濟調查局或滿鐵主持一面時，曾採用了許多左翼的知識分子，而且得到大川庇護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相當數目。

但是，竹內好對大川周明的伊斯蘭觀點的分析，卻堅持了一種對西方話語的固執。

這位曾就職於回教圈研究所、在皇軍佔據的北京做過清真寺調查的魯迅知音，在《大川周明的亞細亞研究》的結尾，毫不顧忌前輩如大久保幸次反復強調的——伊斯蘭是愛的宗教、伊斯蘭

從不用強力迫人改宗、“一手握劍一手持經”的說法乃是無端誣讟——仍然一邊引用著大久保幸次深有學理意味的告誡，一邊堅持這一說法乃是伊斯蘭的精髓。於是，把向摸索思想出路的大川周明，朝著對伊斯蘭負面的方向闡釋。

在這核心的一句之上，由於缺乏對伊斯蘭學知的把握能力也缺乏痛切的宗教體驗，竹內好製造了他思想的悖論。他率先熱烈肯定的、一位墮入歧途的思想家可能有過的純真和深沉，在轉了一圈之後又遭受了他的否定。

他對大川周明伊斯蘭觀點最深沉處的缺乏感覺，恰似這位魯迅權威在整本的魯迅闡釋中的某些粗暴。如——“魯迅的小說太差。雖然在近代文學傳統淺薄的中國一般小說都差，但即便如此魯迅的小說也差”、“〈肥皂〉是愚作、〈藥〉是失敗作、〈傷逝〉我以為是惡作”——的語言，或暴露了一種個性的武斷，或顯示了一種方法的弊病。⁵

逃脫了監獄、躲進了醫院的大川周明，已經喪失了提議日本參照伊斯蘭的餘地。如他以行為和思想表明的一樣，伊斯蘭對晚年的大川周明，早已不是一項政治途徑，而只是一種思考傾向。反之，倒是左翼陣營的竹內好，居然固執於西方堅持千年的“一手握劍一手持經”意識形態思路。評論魯迅尚可聽由個人的感性；而對大川周明——實際上是面對伊斯蘭的歷史文化體系——若欲解說，需要跳出西方賦予的學知桎梏，需要潛入研究對象奧深的火候。

無論“一手握劍一手持經”也好，一代狷介文人的蓋棺論定也好，世間的思想探求，並無禁忌。但是回頭反顧，從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辯護者，從舊式的亞細亞主義“者”到當今的亞細

⁵ 竹內好：《大川周明のアジア研究》，竹內好セレクション2，2006年，第364~365頁；竹內好：《魯迅》，日本評論社1944年。

亞主義“家”，曲折一條軌跡中，隱現的警示誘人遐思。

今天喜歡亞細亞主義言說的人，比起宮崎滔天和大川周明，更呈示著一種曖昧。有一種習癖，姑且稱之為“二次東方主義”吧，尤其在日本學人中傳染，久治不癒。若檢討原因，只能說他們欠缺一種素質：一種與被關注的對象結合，以心比心、甚至獻身的素質。

4、

更多的亞細亞主義者，乃是“行動型”。

被啟蒙的思想一旦付諸行動，又受到了地理的限制或鼓動。

無數狂熱的青年，在明治以來亞細亞主義的魅惑下，把中國認做了實現青春抱負的亞細亞。不消說，如此的亞細亞主義，即便確有對弱小各族的款款衷曲，更鼓噪著挑動邊疆各族反叛、破壞中華帝國大一統的轟隆鼓聲。

他們行為中的“亞細亞主義”因素，在炮火與血污的遮蔽下，已經很難剔別。他們的人生，也都終結在帝國覆滅的業火與悲劇中。

“滿蒙派”，是行動型亞細亞主義者的複雜核心。

比如關東軍核心參謀和建國大學的首倡者石原莞爾，他曾參與導演“9.18事變”、卻又反對發動盧溝橋事變；

如從柏林出發，實行了騎馬橫斷歐亞大陸的壯舉、費時一年零四個月經西伯利亞東端返回日本的軍官福島安正；

再如以四冊影響甚大的回憶錄留名的、明治時代的遠東特務石光真清；

還有在日俄戰爭中大逞謀略，重金煽動波蘭和芬蘭的革命風潮、在俄國發動暗殺、遊行、甚至結交列寧支援布爾什維克革命、被譽為一人超過十個師團的間諜外交官明石元二郎；

——叩問其思想，都多少與亞細亞主義有緣。

當時這些心頭懷著亞細亞主義挺身於行動的日本人，軍人民間大體有南北兩派。南派的目標，大約是上海兼及廣東以南；北派則對準了所謂滿蒙。

不消說滿蒙派人數衆多。上述石原、石光、明石、福島都屬於此類。因為鮮、滿、蒙對日本乃是一個老問題，與完整的一部帝國興衰史血肉相連的主戰場。所以北派的亞細亞主義者，大都與軍部配合。

漸漸“解放亞細亞”淪為了一句謊言。

明治以來，大國崛起的美夢，陶醉了朝野軍民。“解放亞細亞”的主義，隨著海外雄飛的狂妄，成了一支雄壯的進行曲。或者明說，或者暗示，不必贅言日本是主角、毫無餘地日本是盟主。從文學到理論、更因不尚空談的性格付諸實踐，一切對於亞細亞和甚至遠達印度阿拉伯各民族的興趣與關心，都如茂密的柳枝，從這棵樹根上抽芽。

這樣的言說，在東南亞尤其英屬印度，煽動了一股同感。但這樣的實踐，在東北亞卻撞上了兩個試金石——對亞細亞之一的中國怎樣“同情和保全”，對朝鮮等弱小民族如何“無私並奉獻”。

特別對朝鮮與中國，日本不能逾越利益。於是“保全”換成了分裂，“奉獻”變做了佔有。他們只能一步步撕去亞細亞主義的衣裳，效忠自私的帝國利益。一切“對革命志士的支持”，目標都是毀滅中國——先是腐朽的清朝，後是脆弱的民國。

同樣，比如蒙古，“對弱小民族的扶助”的言論，最終不過是為挺進的皇軍，尋找傀儡和民兵。

這是一切北方派亞細亞主義者的宿命。哪怕他們在早年，可能憧憬過四海兄弟的美景。

由於與老人服部的關係，我該勾勒一下川島浪速的軌跡。

日本關注滿蒙年深日久。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後，喀喇沁旗王爺貢桑諾爾布立即向已處於獨立狀態的外蒙串聯。不料俄蒙方面冷淡，於是貢王轉而投靠日本。為他搭橋奔波的，正是他的親戚清朝肅親王的顧問、自詡“蒙古勞倫斯”的川島浪速。

川島浪速為這位王爺搭線，找到了因萬里單騎的偉績，人扶搖直昇至陸軍大將、馬在上野動物園展覽的福島安正。

1912年1月底，民國大典的禮炮聲尚未散盡，川島浪速就與喀喇沁貢王簽訂了一份契約文件。王爺把卓索圖盟的礦產當做擔保，向日本借款日元20萬。同時簽訂了武器購買合同，明記在鄭家屯車站交貨。軍火果然運到了鄭家屯。但是貢王的人用勒勒車隊滿載武器往回走時，半路卻被東北軍截獲，護送武器的數名日本人被擊斃。

不久，巴布扎布糾合武裝起事。木偶背後的手，依然是川島浪速。巴布扎布曾積極參與外蒙獨立，從而獲得過鎮東將軍等封號。1915年11月，蒙古國政府根據與中國協議，要求正在鹽池一帶活動的內蒙巴布扎布武裝歸回原旗。巴布扎布騎兵入境，經由喇嘛庫倫廟（今東烏珠穆沁旗府所在）、行至白音古秀廟（今東烏旗道特淖爾蘇木南側）時，被前來圍剿的多倫守軍蕭良臣部擊潰。

激戰中白音古秀廟毀於炮火。後來興建的新廟，正是我插隊草原的公社所在。這個地點，距離川島浪速的門生、後來在青海扶貧支教的服部老人“度過青春”的農乃廟，僅60公里之隔。

若嘗試為川島浪速總結一生，也許已經是時候了。

他的行動，無非是利用了與原清廷肅親王、以及與日本軍界福島安正的關係，夢想在東蒙扮演蒙古的勞倫斯，組織“滿蒙獨立”。他的思想，則依然能追溯風行於當時的大亞細亞主義。

出於這樣的念願，川島浪速雖入學於外語學校的中國語班，卻更喜歡當時“興亞會”的思想，在行動中摸索抵抗白人侵略、實現亞洲救亡的實踐。於是，放浪於中國北方。甲午之戰，他充當中文翻譯隨軍，先結識了乃木希典。臺灣割讓之後，他一時在臺灣總督府謀職，後追隨同鄉福島安正（當時還是少將）參加鎮壓義和團的聯軍，做陸軍翻譯，住進了北京。

不知確否，據說當八國聯軍在頤和園和圓明園大肆劫掠的時候，川島的日軍在紫禁城卻保護了文物，並受到宮內人等的尊敬。這樣川島得到了清末八大親王之一慶親王的賞識。慶親王委託他參照日本模式，改造滿州警務。他參與過北京警務學堂和工巡局的初創，上司便是肅親王。

而肅親王的妹妹，正是蒙古喀喇沁王府的福晉（夫人）。一根長久以來、苦其斷而難續的線，終於一朝繫在了一起。

川島首先做的，就是把志在遠方的河原操子，送進了喀喇沁王府開設的毓正女學堂做教師。1902年前後，日本關東軍在東蒙一帶尚沒有大的作為時，河原操子就住進了喀喇沁旗的貢桑諾爾布王府。她也是個傳奇人物；當時一面教書，一面搜集情報。無奈學劍不成，歸去日本做了女演員。老後著書，題為《喀喇沁王妃和我》。

辛亥革命爆發，滿州望族逃竄。川島浪速奮力地幫助肅親王一家逃離北京抵達旅順。這一家，共有五名側室、38個子女、約30個傭人，共計約60口之多；全仗川島浪速斡旋關東都督府，借來白玉山麓的俄國旅館，供一族男女居住。此外川島還“營救”了巴林王爺一家逃離北京。川島並支持這些亡清舊臣組織“宗社黨”，漸漸奠定了他在東蒙的基礎。

大正四年（1915年），川島浪速寄以厚望的巴布扎布騎兵隊，不過騷擾一番而已。中國方面惟用多倫一營守軍，就撲滅了川島心中最後的火星。他只能長嘆生不逢時，在巴布扎布覆滅、自己也與日本軍部矛盾日深、最後被關東軍踢開後，川島浪速黯然回

到了東京。

肅親王念及川島無子，就把第 14 女金壁輝送給他做養女。信中說：送給你一件玩具。是為川島芳子。據云，六歲養女在日本長到 18，某日突然哭喊著跑出養父房間。她從那一日起，身著男裝，口操男語，出落成一名瘋狂的半軍半諜的怪女人。

據李香蘭回憶錄，她初識川島芳子時，川島芳子就對李香蘭說：“以後叫我哥哥！”在旅館前廳，她見過川島芳子在衆目睽睽下，解開男褲露出大腿注射毒品。在電影院裡，川島芳子身穿軍服，肩上架一隻猴，昂首走進包廂。幕間休息時，她在包廂裡高喊“沒意思……”使全場瞠目。⁶

川島浪速的這位養女 20 歲時，與巴布扎布之子結婚。儀式在旅順的大和旅館舉行。如某種象徵——在滿座的關東軍參謀和滿蒙王族之中，她一身禮服，緊拉著亞細亞主義魁首頭山滿的手。

後來，緊接著日本陸軍在 1931 年發動的“9.18 事變”，幾個月後，日本海軍也在上海發動了“1.28 事變”。據川島芳子判刑書，上海事變的背後，就有川島芳子的“加勢”。⁷

1945 年日本戰敗，她被中國當局逮捕。候審期間，雖然川島浪速竭盡全力，馬上寄來了養女證明甚至徵集了簽名，但由於他抱養“玩具”時並未給她入籍，川島芳子不能被認定為日本人。1946 年，她以叛國罪被處死刑。

川島浪速人生的最後一幕，上演在“滿州國”的兒皇帝溥儀訪問日本之際。“滿州國侍衛處長”工藤作為皇帝特使，對川島浪速家進行了禮節性訪問。那時被稱為“浪漫主義者兼革命家”的川島浪速，已是一位 70 老翁。儘管他懂得傀儡一詞的含義，還是換上了燕尾服出迎，一面忍不住潸然淚下。

⁶ 李香蘭：《李香蘭を生きて》，日本經濟新聞社，第 118~119 頁。

⁷ 李香蘭：〈附錄〉，《李香蘭を生きて》。

5、

1877年，日本出現了最早的大學——東京大學。

十年後，東京大學文科設置“博言學科”，其中有朝鮮語、愛努語、梵語等課目，開了直接掌握研究對象語言這一方法的先河。

1876年，東本願寺以佛教一宗派之力，向歐洲排遣梵文和印度學的留學生，南條文雄在英國取得了日本東洋學的第一號博士頭銜，學成歸國。同時西本願寺也排遣高楠順次郎赴歐，從德國拿回了博士學位。他們回國後，為日本打下了牢實的印度和佛教學根基。

趁著1900年日本參加八國聯軍、到北京鎮壓義和團運動，南條文雄作為東本願寺慰問使，在北京與日軍一起，把黃寺所藏藏語大藏經甘珠爾八類151部350冊，做為日本駐北京軍隊的禮物獻呈給天皇（轉東京大學收藏）；並把17世紀的106函1016部甘珠爾、252函5001部丹珠爾，以及宗喀巴全書等藏文經典，送給了東本願寺所屬的大谷大學。

對俄戰爭勝利後，奉天（瀋陽）落入日本控制。在另一派東洋學鼻祖、時為記者的內藤湖南的加入下，日本早期學術的開創者們又從奉天、尼泊爾、北京等地，橫奪賤買，把大量蒙文、滿文和梵文的佛典運回了日本。明治天皇甚至拿出宮內費用，支援這一資料奠基。只是，1912年關東大地震時，保存在東京大學的珍貴經典，被一場孽火全部燒毀。

日本東洋學的20世紀，就這樣揭開了篇章。

1897年京都帝國大學開設，又一個學問中心隨之誕生。不久第一高等中學校長那珂通世提出劃分東洋史與西洋史的理論，在世紀之交迅速發展的漢學科與史學科中，後日學術泰斗如桑原鷺

藏、白鳥庫吉，都是最初的學生。

他們逐漸朝著兩個方向集中精力：一是中國本身，一是歐亞大陸。後者的深入“內部”注重語言學的傾向，以後代代綿延。

在百年的跋涉之後，如果在今日回首眺望，“東洋學”已是日本的驕傲。象牙之塔內的技巧，實證主義的謹嚴，濃重的學術油彩，厚厚地遮蓋了亞細亞主義和帝國雄飛的底色。把它與亞細亞主義並論，其實不太合適。

但它的內容，又遠遠溢出了學術。確實，在明治以來的一切日本知識分子活躍的角落，都能發覺大亞細亞主義的影子。哪怕音樂、電影、佛教、小說，更無論人類學、考古學、甚至昆蟲學，都糾纏著說不清理還亂的背景，都有著發達的思想、人脈、著述。巍然其中的要數東洋學——它與大學的設立、資料的收集與圖書館學的奠基、田野與現場的調查、諸種語言包括其古語的讀破，分流匯聚，蛛網縱橫，形成了一種多中心的東方知識體系。

歐亞大陸、伊斯蘭世界、中亞及蒙古，宛如一座座巍峨高峰。對這座學術山脈妄圖整理，是最蠢的發想。無論哪個領域學科，僅著作一項就是百年積壓汗牛充棟。整理它，幾乎就是在書的迷宮迷失，幾乎就是在茫茫考據中沉沒。誰能盡知它的考據艱深與天下志向？道不盡其中複雜的包含！

隨筆舉一個例子，如桑原鷺藏，若想簡述他的鉅著《蒲壽庚考》，⁸就需要一個領域的讀破。以散文的概括，很難容納他立足19世紀式的實證學術、以泉州豪族蒲壽庚一家為軸、徐徐勾勒出來的一隅宋元之際的圖景；面對那種綿密考證銳利發現、一分正文三分註釋、驅使古今中外資料的專深，我缺乏概括的學力。

當西方實證主義的手段與時代的鉅大視野融會以後，他們建樹的博大，令人瞠目。或者再選一座“蒙古學”的山崗，觀望一

⁸ 桑原鷺藏：《蒲壽庚の事跡》，1923年。

眼已有的業績？

從那珂通世遠在明治四十年（1907年）第一次以《成吉思汗實錄》為題完成秘史的全譯以來，僅在《元朝秘史》一點之上，側重於歷史的譯本，就有小林高四郎《蒙古的秘史》（1941年）、白鳥庫吉《蒙文音譯元朝秘史》（1943年）、村上正二《蒙古秘史》（1970~1976年），以及側重古代蒙古語言分析的、如小澤重男《元朝秘史全釋》等諸多譯本；加之論文、調查或遊記，截止於1980年便有近四百篇。再擴而展之兼及廣泛的中北亞，僅登錄於1988年編《中亞研究文獻目錄》者，就超過了1.5萬種。

— 這些都不是這本小書的選擇。

但也不能對東洋學閉口不談。因為看似雕蟲的學術，尤其是時代思潮的產兒。

究竟挑選怎樣的例子，才能觸及它的本質呢？

白鳥庫吉於1907年發表〈亞細亞研究乃戰後一大事業〉，顯露了他的初衷：

國人以為盲於遠東事情乃屬當然，又欲與西人於其地相爭利益。余輩吃驚於國人如此無謀，更深恐靠不易戰勝所獲之威力，將於和平競爭中消滅殆盡 — 是乃余輩疾呼亞細亞之研究，喚起世人注意之所以。

白鳥庫吉是一代邊疆派學術的代表。

他企圖模仿英國的皇家亞洲學會和法國的亞洲學會，組織日本的亞細亞學會。雖然最後“東洋”置換了“亞細亞”的名稱，但以後日本各亞洲研究的基地和實體，如滿鐵調查部、東方學會、東洋文庫，都能追溯到這個淵源。

— 他的《蒙古秘史》轉寫本與漢文刻本共印，查詢方便，讀著流暢，是我在學生時代使用最多的一冊。

與學問的邁進齊步，在白鳥庫吉的建議下，日本以京都大學等國內學者為教授核心，在各殖民地和偽政區都創建了大學。

1926年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、1928年臺灣的臺北帝國大學、以及1938年在長春的建國大學都逐一開學。

有趣的是，最短命、學生最少的“滿州國建國大學”，在其中抱負最大。建國大學的倡建者，是著名的關東軍決策軍官、亞細亞主義者石原莞爾。按照石原的設想，未來的建國大學應該是這樣的：

— 建國大學完全排除既有大學的教育方法。既排斥馬克思主義又排除帝國主義。大學根本的目標是民族聯合的實現。它將是日、漢（包括滿）、蒙、鮮、俄五族子弟共學，培養不止滿州且囊括中國本土、印度與東南亞的一所亞細亞政治精英養成所。就學期間，學生們將“一塊吃、一塊住、一塊用蒙語朝語或日語打架”；三年在校讀書、三年投身社會。尤其後期三年，學生們要進入底層吃苦耐勞，再把體驗的內容上昇為理論。建國大學打算誠邀托洛茨基、胡適、周作人、甘地、布斯等重要人物任職；但這些受聘者不都作為教授、一部分人將作為“研究的素材”，進入這所“亞細亞大學”。

— 如今讀來恍如聽夢。

但這個用日語發出的聲音，也並不完全陌生。在這些設想裡，除了閃爍著一代皇國軍人的虛妄之外，若對那時代的亞細亞主義有所理解，也可能聽出一絲使命感。

可嘆石原莞爾的宿命，是在挑起血腥戰爭之後接受歷史的嘲弄。即便在日本的殖民地大學系統裡，這一所大學也最是毫無聲色。臨開學才定下的大學校長，由偽“滿洲國總理”張景惠充任，典禮掛出的牌子上，寫的不是亞細亞的解放，而是傀儡的“建國”。

那麼，究竟有沒有能匹敵於宮崎滔天或相馬黑光式的熱情、今天仍能給我們以啟發和反思的學術呢？

1936年，小林元和大久保幸次合著的《現代回教圈》出版。引用如下的段落，或許可以省去我的評論：

回教圈並非異國情調的花園。橫跨亞洲、非洲和歐洲、擁抱約兩億四千六百萬人民（此數不確——引者註）的回教圈現實，惟乃歷史之給予。至少對今日回教世界的天方夜譚式幻想，不過是錯了時令的感傷。只是我們此刻提出的“現代回教圈”，果真能對破棄這種幻想發揮作用麼。⁹

……確實我們之中注目回教與回教圈的同胞甚少。但多數人們放置如此題目且對之輕蔑、並跳過回教徒世界一味將視覺集中於遙遙彼方歐洲舞臺的那般傾向，已然應該一併反省。作為日本商品挺進地的他們，作為殖民地分割客體的他們，作為世界史不可欠之一部的他們，作為世界文化構成因素的他們——如此這般的回教聚集地，難道不正蘊藏著呼喚我們注意的無數問題麼。¹⁰

……回教徒喲，莫要再迷於中世紀的狂信，指著凱末爾主義者的土耳其說，汝乃無神之國。那不過是偏離季節的誹謗。莫若去充分加深對回教生存的認識與理解。實際上今日少數抱有進步思想的回教徒正步步企盼難題的解決，他們豈不正呈示了為明日飛躍而做的獻身努力！想必，世界史之回教徒亦不屬神聖例外。在現代，回教徒亦一如其他宗教，未嘗被置於沉湎於法悅幻境的地位。呵責之際回教徒喲須知，為解消乃屬歷史必然之今日回教危機，其最正確之鎖鑰，究竟其藏隱何處！¹¹

……此時此刻回教徒不能儘是迷狂的人群。難道，隨帝國主義式的爭霸日甚一日、隨著它對殖民地依存的增多和進而對其統治力

⁹ 小林元、大久保幸次著：《現代回教圈》，四海書房 1936 年。

¹⁰ 小林元、大久保幸次著：《現代回教圈》，四海書房 1936 年。

¹¹ 小林元、大久保幸次著：《現代回教圈》，四海書房 1936 年。

的加強、兼之殖民地土著民的窮困化、抵抗、民族解放運動的普及——以如此帝國主義諸國的寄生以及各殖民地的分離為背景，泛回教主義又能自何處尋得它的依據？值此現代，回教圈世界正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坳堦中橫陳之際，泛回教主義豈非一面影子盾牌，毫無高見！¹²

用語已多少陳舊，內容也不盡正確。但是這些寫於70年前的言辭，如今即便拿給穆斯林閱讀，仍然感覺新鮮，甚至令人振聳發聵！

東洋學還是東方學？

把薩依德的東方學改一字，就是日本的百年老號的東洋學。它確有東方主義的鏤刻燙烤和不褪的底色。但企圖以東方學理論來斷定東洋學，是困難的。

E·薩依德的東方學、東方主義學說，在日本尤其引發了強烈的反響。一部分人在力爭表達：日本的東洋學，雖然拖著一條不乾淨的尾巴，但它的呼喚裡也包含著對薩氏所言東方學的揭露和反抗——這種聲音，就是亞細亞主義。

日本確實是一個豐滿的例子，它能證明薩依德的學說，也能對之駁難。

板垣雄三曾經這樣回顧說：

在那樣一個歷史階段上，即便是為了向東方主義同化、也必須在自己的世界觀中加入伊斯蘭，於是他們有過與伊斯蘭世界緊密結合了的感覺。比如日本的所謂東洋學，無論是白鳥庫吉（東京帝國大學教授，1865~1942）的中央亞細亞也好，河口慧海（大正大學教授，1866~1945）的印度次大陸也好，大穀光瑞（西本願寺宗主，1876~1948）的中亞探險也好——他們靠著能與歐洲人角力、甚至凌駕於歐洲人之上的對伊斯蘭研究業績，有過——想籠絡伊斯蘭世

¹² 小林元、大久保幸次著：《現代回教圈》，四海書房1936年。

界於自身之中的主題。¹³

讀著小林元 1936 年的舊作，我體會到了什麼是“結合了的感覺”。

雖然到底有多“緊密”，尚可逐一甄別。

是的，一種在帝國主義危機中培育的“天下已任”，使這種東洋學比起歐美東方學，處處深之一層。不僅分庭抗禮，在一些刃口分寸之上，它甚至融入了文明主體的發言。但霸道的已任，也使學術從出生就有一股虛妄的胎味；恰好與俯仰殖民主義鼻息、啜飲一瓢剩羹於繾綣的中國知識界，互為補足的一對。

東洋學畢竟難於歸劃東方學的另一個原因，是中國古典確實已屬東方的共有，對它的追究，不能與西學的漢學相提並論。

(三)

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思潮，後來終於在昭和前後分流了。人們說：在左翼走向國際主義方向的同時，所謂亞細亞主義似乎被右翼獨佔。

中國、朝鮮、日本之間，關於亞細亞的溫情對話，呈著一副滑稽的樣相。

與日本的富國強兵同步，超過 50 年不間斷的欺凌，使謊言難能甜蜜。

— 日本是亞細亞的解放者麼？

對中國和朝鮮而言，簡直無異是狼在問羊：我曾打算吃掉你麼？

儘管日本不願停止關於亞細亞解放的言說，但是包括中朝，

¹³ 板垣雄三：〈日本該怎樣面對伊斯蘭〉，《世界》雜誌 2000 年 9 月號。

大多數亞洲人拒絕這一呱噪。

包括他們津津樂道的土耳其。在那個土耳其遭逢的末日，日本是列強盛宴上的持刀饕餮者。1919年帝國主義列強召開巴黎和會，核心的目的就是瓜分奄奄一息的奧斯曼土耳其。日本算計良久，它吸著鼻子，嗅著土耳其盟友德國的盤子，割下的卻是中國的血肉。

一面熱衷於對白人殖民世紀的揭露批判，一面卻對自己祖國的野蠻侵略百年嘴硬——用儒家的術語說乃為不知恥。更大的遺憾是，對一部分“真誠的亞細亞主義者”而言，夢想與認同，都被粉碎了。

從20世紀初開始的百年同胞訴說，誘使所有中國的機會主義都迎合過日本的亞細亞主義。但浸血的事實更加雄辯。所以它也引發了李大釗、尼赫魯不得不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場，作別樣的亞細亞主義解說。

今天滄桑已變，如似種種歷史的陳跡，引人激動的主題似乎已經更換，綿延一個世紀的熱議，要結束了。

真結束了麼？

不。它如一個幽靈，未曾輕易消散。本來不過是日本一翼的理論，而如今，很多人都喜歡上了它。連橫抗秦，營造新的亞細亞主義、讓日本和中國這對怨敵成為同盟——這一思路，常使人浮想聯翩，並感情衝動。

時值21世紀險惡降臨的今日，塵封日久的亞細亞主義，是否還能被發掘出新的含義？

是的，不單惟獨今日，亞細亞的夢想永遠都在不遠前方，引誘和勸說著，不斷閃幻出魔性的光彩。

當新一輪的帝國主義世界征服又洶洶開始，當種族歧視的舊瘡又溢出惡臭，當亞洲的多數民族與非洲、拉丁美洲的衆多國家

一樣又掙扎於貧困、盤剝、威脅之中 — 在新的時代感召之下，謀求亞細亞諸國之間、以及亞細亞與整個第三世界的互助、支援與同盟的聲音 — 又漸漸響亮起來。

— 如果日本能夠掙逃出脫亞入歐的魔魘，如果它能放棄躋身列強、在全球化榨取弱小的進程中分一杯羹的私謀，如果它能正視自己祖國的百年滄桑史，他們應該有勇氣揚棄、繼承、實踐，如它的一介平民，拋棄亞細亞主義中的帝國污穢，堅守亞細亞互助的道德大義。

— 如果中國能夠破除崇洋媚外的舊癖，如果它能清算盤踞體內的大國情結，如果它能在崛起中警惕對弱小民族的歧視，如果它能珍惜自己的包括革命和國際主義的傳統，它也應該能判斷、尊重、理解、結盟於身居其中的亞細亞，實現一種超越了帝國主義的強國夢。

被動也罷、自覺也罷，兩國都必須交出答卷。

東南西北，亞細亞的每一個角落，都正在嚴峻地注視著。